

13.04

仙遊文史資料

第二輯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
福建省仙游縣委員會編

仙游文史資料

第二輯

818/31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會議

福建省仙游县委员会編

福建省莆田县印刷厂承印

一九八四年七月

目 录

仙游建党沿革.....	陈国柱 (1)
历史文献三篇.....	县党史办供稿 (16)
仙游县学生运动史的光辉一页.....	党史办供稿 史存高整理 (22)
仙游旅馬华侨与革命.....	张 霞 (34)
《仙谿志》簡介.....	陈长城 伍 言 (40)
仙游街道形成的历程.....	余启锵 (47)
木兰溪航运簡况.....	林求真 (52)
九龙岩探胜.....	邱 畊 (55)
仙游冰糖史話.....	刘习知供稿 余启锵整理 (57)
汽車无刷电机填白記.....	叶羽经提供材料 郑梅生执笔整理 (68)
国民党仙游县党部卅四年記.....	林宗湯 (80)
張逸舟橫行閩海的始末.....	张 驰 (89)
解放前仙游民軍概况补充	余启锵 (118)
清末仙游教育簡况.....	陈永春 (128)

从金石山談到仙游一中	朱启球 (145)
莆仙戏的源流沿革	林庆熙 (154)
莆仙戏的主要剧目	林庆熙 (164)
莆仙戏音乐志	谢宝桑 (168)
抗日时期仙游的一支戏剧劲旅 ——記抗日模范乐剧队	柯如宽 (180)
莆仙戏联集錦	余启鏊 (485)
編后的話	(190)

仙遊建党沿革

陈 国 柱

一、从“五四”到北伐軍入閩前的革命运动問題

△ 民国七年（公元1918年），许崇智率軍入閩，粵軍曾經打入仙遊、莆田等地方。那时虽然是軍閥混战时期，地方上有一些所谓民軍的武装，都是操在地主豪紳的手里，不过农民和青年知识分子，也不少人积极参加这个运动。当时的口号是“閩人治閩”，“反对北狗统治福建剥削人民”等等，包含进步的作用。我和我的哥哥曾参加杨万順的民軍部队，在莆田攻城多次，以后又到仙遊和他们联络活动，大约有半年之久。粵軍回粵后，我们才回学校念书。

在这时期，莆仙人民主要的斗争是民軍运动，也就是反对北洋軍閥的斗争。虽然当时民軍头子是豪紳地主和流氓分子，但部下却都是贫困农民；因为贫困农民生活沒有出路，只有参加“土匪”，才能从事反对苛捐剥削。

“五四”运动时期，我在哲理中学读书，参加了“反日抵货”运动，当时仙遊的情况不清楚。

“五四”运动后，莆仙一些青年学生往外求学，但为数并不很多。当时，国立大学比较难考，进私立的经济又花费太多。所

以，在北京各大学的只有数个人，在上海各大学的也只有数个人，在厦大的有十来人。

△ 厦门大学成立于1921年，上海大学成立于1923年，大夏大学成立于1924年。大概是1923年以后，在厦大和上海念书的莆仙学生，目的都是希望将来升官发财，所以只注意到学科本身，对于社会主义学科的研究者寥寥无几；有的根本没有念书，整天花天酒地。1924年厦大闹风潮，大多数学生跑到大夏大学；泉属，兴属的学生，在大夏比较多，在上海大学也有几个。莆仙留在厦大的学生为数不多了。

上海大学本来是邓中夏和瞿秋白等同志创办的，是当时党中央所领导的，其中教职员绝大多数是共产党员，为上海青年学生运动的中心。其次有大夏大学、南开大学、中国公学、交通大学、复旦大学、群治大学、东亚专科等学校。当时党的工作主要在于工人运动，所有主要党员，都做工运。本来党团工作有分工，党专管工人运动，青年团专管学生运动。所以各大学的学生，首先都参加团，到一个时期以后，才参加党或转为党。当时许多学校的支部，都属团的领导。因而莆仙留沪的同学很多接触社会主义学说，并且接触共产主义思想，特别是上海大学的同学。

△ 1923年以后到“五卅”运动前后，研究马克思主义是公开的。当时以为是时髦，当然真正接受与否，要看各人的思想是否不断进步。至于真正参加组织的并不多。莆、仙、泉籍的学生，在上大的有陈伯达、林嵩龄、陈嘉谟（陈少皋）、郑杰民、张剑，在大夏的有陈国柱、吴世华、杨世宁、杨邦彦、周清水等，在交通大学的有黄苍麟等。大夏支部初成立时（团支部），

闽籍学生有陈国柱、陈兴钟、杨邦彦、蔡珊等四人。而黄苍麟在交大与陆定一同志一起参加团，在上大的林嵩龄、陈嘉谟、郑杰民等参加了团。在复大的有方泗英（方尔灏）、陈昭礼（都是福州人）。“五卅”运动后的1925年冬天，大夏的领导表现很反动，当时，有许多闽籍学生愤而跑到广州中山大学就读，在那里参加了党和团。

△ 1926年（北伐军入闽前），我从上海大夏大学毕业后转回莆田，任中学教师，即开始建立莆田党的工作；陈兴钟和方泗英（方尔灏）已先一年回福州，开始在福州建立党的工作。当时黄苍麟、林嵩龄、陈嘉谟（陈啸高）尚未毕业，（莆田人民革命大事记所谓成立三人党的小组不实）。北伐军入闽后，广州那一批学生回到厦门，闽南一带建立了党的工作。因而福建党的建立，在闽南方面，由广东回来的人领导，闽北方面，由上海方面来的人领导，这两方面都与我有联系。

二、关于莆仙建党建团的问题

△ 关于仙游的建党建团的情况。在北伐军入闽以前，我所知道的是民国八年以后开始，当时陈炯民在漳州，曾有留法勤工俭学会组织，招集学生到法国去做工和留学。我因为没有钱，借到钱后已来不及参加，因而没有去。福建方面去的有漳州的郑超麟、仙游的×××，他们在法国留学和周总理、李富春等同志在巴黎参加了党。郑超麟大革命时回国，曾到了厦门，大概在1929年间，代表中央到那里巡视一回，以后即投入托陈取消派。而仙游这个人回国以后，大概就消极了，以后曾做国际的什么贸易买卖，发财去了。解放后，总理曾找过他，因为名誉不太好，就没

有再找。我于1950年在福州时曾见过他，满口是生意经，什么马列主义都不懂，就不敢亲近他了。此人可能同C、C、（编者注：陈果夫、陈立夫把持的中统特务组织）有关系，现在不知去向，再没有人知道。他们算是福建籍的最早共产党员，但都没有在福建做建党的工作。（编者注：关于这个问题，1983年4月5日郑超麟给仙游党史办来信作了说明，说是这个情况有出入。）

另则仙游当时有陈嘉谟（陈啸高）、陈侃、李拱辰等人在上海念书，陈嘉谟在上海大学，曾参加团，同我有联系。在福建省扩大会时，他是仙游的负责者，但没有什么实际工作，以后派他回仙游，当时工作情况我不知道。还有一个郑杰民也是上海大学的团员。此人以后变节在海军林寿国旅当政治部主任，也成为国民党的C、C、分子，曾在福建当民政厅长，改名为郑天秀，是个有名人物。陈侃是中国公学的学生，当时也称左派，其实不是共产党员。这些人还有张兆焕、张骊、李果、李拱辰、陈炳中、林友壬等称为“乌派”，他们在地方上活动的目的是争夺权利，不是真正的革命工作。“清党”以后，都做了国民党的要人去了。在北京读书的有黄经芳，别号纬庭，即黄震，是仙游东乡人，北京师大的党员，与江西的邵式平同志同时参加“八一”南昌起义，曾随军到东江。后黄回到莆田，还是党员，1929年的名单中就有他。解放后是莆一中有名的校长，以后在农工民主党工作，当过省农学院教授，是“脱帽右派”。我离开莆田后，他是党的负责者，对莆仙的党，颇有贡献。仙游的王青圃（于洁，吴梅）同志是他的亲戚，由他介绍给我，我才介绍于洁入党。莆仙第一次的武装运动，是我和他秘密进行领导的。他还派他的妻弟郑纪，第一次做了“跳山头”的运动。郑纪以后被国民党枪毙。

黄金秀是他的学生，1928年4月在仙游东乡反鸦片捐斗争中被林寿国枪毙。1929年我主上海时候，黄经芳曾写了一本纪念黄金秀的纪念册，写得很全面，原已经付印；我曾作了修改再拿去印，以后不知道是否发行，情况不明。

至于黄震本人，1929年后脱离组织，到上海一带教书，当时和上海的党还有个别人的关系，以后跟我就没有来往了。林友壬是仙游大财主的子弟，此人我们认识。陈炳中是燕京大学毕业生，大革命时候不晓得如何活动当上莆仙的监察员，此人冒称革命，实极反动，当时即公开反对我党，而且向哲理学校告密，说我是莆仙共产党负责人，使我工作更不好进行。但他不久被第一军吴威部枪毙。其实他们并不是共产党，只是仙游反动的民军对立派，因为内部矛盾，被他的政敌诬指为共产党而加以枪毙的。他们是当时属于孙文主义学会的一派，以后都参加国民党做官去了。

仙游这些人中间，陈嘉谟、黄经芳确是党团员。在北伐军入闽后，确实在那里活动，至于建团建党工作，他们还是谈不上的。

△ 一些历史资料说到的福州团地委曾派人到莆仙工作，那不是事实。但根据我所知道，当时莆仙的革命运动，不但没有S Y和C、F的气息，即国民党左派的影响也没有的。

仙游正式建党的时期，是1927年11月间。本来在北伐军到仙游的时期，据说陈嘉谟曾在那里活动。他拿一本签名簿，到处公开征求共产党员，凡签名的即是共产党员，大概张驰、陈侃、李果这些“乌派”的人物，大多数都签过名。可是陈嘉谟在社会上没有什么地位，“乌派”并不重视他，有时人们还玩弄了他。所

效陈嘉谟的做法，只是在上层知识分子中轰动了一下，根本没有下层基础，结果“清党”一来，他们都一哄而散，转而投靠了林寿国做官去了。郑杰民曾和我到上海，我到武汉找党，他留在上海观望，后来被仙游“乌派”一班人拉拢回到仙游，以后大概就是走林寿国的路了。

1926年下半年，我回到漳州省委工作，参加省委。阴历九月初三日我母亲逝世，告假回家奔丧。经省委批准，要我回到莆仙做整顿党的工作，重新建立党。我于九月初六日，由江口上船，秘密回家，即害大病。等到十月底安葬母柩后（在奔丧期，当时是宋耀华、陈天章、吴梦泽等负责，我因不敢到城，和他们在家里秘密讨论布置工作），以为莆田不能安身，由黄经芳、宋耀华等商定要我到仙游来，在仙游县立中学教书为公开职业，重新从事建党的工作。

到仙游后，住在县中附近金石山的一个老百姓家里。在这期间，我到处了解情况。当时陈德来、曾天毅是国民党县党部的委员，以后同他们混在一起。我找陈嘉谟问过去共产党的情况，才知道他们都是空的，不但没有基层组织，甚至连党的秘密机关都没有。在这期间，我认为他们都不可靠，连陈德来等（已经消极了）我都不承认他们是党团员，李拱辰、张驰等更靠不住，我想非重新找人发展不可。于是我就到东乡榜头王青圃家里，看他家里生活困难，又决心革命，我就介绍他入党，由他在那里发展组织。结果，他找到陈博（林步云）、王××等十六人，多数都是农民，成立了秘密组织，建立一个党支部。另外在城外西门兜，我又找到我的学生许淑修，介绍他入党，由他发展，以后由许淑修找到一个陈××（此人在福州时曾写信给我，名忘记），

又找到南方乡下一个姓郑的共三人成立一个支部。同时在1927年4月间，我在兴太山区上宫地方避难时，在那里找到林锦堂、林步庭等八人，成立一个支部。这时仙游才正式建立党的组织。当时成立了仙游县委，我自任书记，王青圃（吴梅）任组织部长，许淑修任宣传部长，林步庭是县委委员，至此，仙游才正式成立了党组织。所谓过去陈嘉谟等的仙游党的组织，无形取消。这是1927年11——12月的事。仙游党的正式成立是这个时候，王于洁（王青圃同志）入党也是这个时候。许淑修这个人还在，以后如何消极，我不知道。郑纪以后当“土匪”，被林寿国枪毙了。他当“土匪”是我们秘密做武装运动的开始，他有一种秘密的药方，把药放在米饭里，吃下就同麻醉药一样，人们不能动弹，倒在地上，眼睁睁地看人缴他的枪。郑混入某股“土匪”队里，当了伙夫，用药麻倒队里边人，缴了二十枝枪，自己搞起来了，以后失败被枪毙了。陈博等以后的结果不详。王青圃在1928年春东乡反鸦片捐暴动失败，跑到莆田，即在店头村起义。蔡珊没有这个人，这和陈名哲的蔡珊是另外一个人。郭珍疑是郭寿銓同志，省立四师学生，是我的学生，在仙游牺牲了（有人说押到莆田后牺牲）。当时还有林植，是上海大夏大学的学生，在上海由我介绍入党，回到仙游，也被枪毙了。大概继郭寿銓以后被枪毙的都是仙游党的负责人。

1928年春，由于县立中学校长黄良骏（乌派人物）是上海大夏的同学，答应我在县中学当国文、历史教员，不久又当某女中的教员。那时我有公开职业，除教书外，大肆活动，时常到东乡、南方（仙游到枫亭中间一个大镇）活动，在南方也成立一个支部，只有三个人，名字忘了。在学校里我找到几个对象，但不敢

公开召集，因为当时反鸦片运动太紧张，林寿国系统的人对我暗中监视，以后就不敢到外面走了。当时的工作计划是依据现有的关系，发展地下党组织，以反对鸦片捐为对象发展农民斗争，在斗争中发展组织。同时，准备武装运动，发展枪械，可是干部太少，又没有经验，我自己又不亲到外面召集，结果东乡暴动被镇压后，虽然组织未被破坏，但却不能活动了。

一直到1928年5月初，我要求到莆田一次，当时正是五一节（国际劳动节），我到莆田，林寿国就派人暗中跟踪，要逮捕我。有一天我正在丰尾林嵩龄家讨论莆田工作，忽然省政府密缉的公文到莆田县。县府收发公文的某吏回家告诉他的兄弟××，首先到宋耀华那里通知，后莆田县委派同志在东西南北城 门 等我，阻挡我入城。又通知林嵩龄处叫我逃避，于是我就隐藏在丰尾林家数天，到广业等处布置工作，经莆田县委讨论（当时我们在北门外延寿桥头开会，到会者有黄经芳、宋耀华、吴梦泽等数人），结果决定我回厦门向省委报告，另外分配工作。莆仙工作由黄经芳、宋耀华、黄苍麟、吴梦泽、王纪修等负责，仙游暂由吴梅负责，我并移交上官、南潭等处的关系。由莆田笏石头坐木船到晋江转厦门，时在1928年夏天。从此，我就永离莆仙了。

三、关于“学术研究会”的问题

莆田组织研究会的问题，我的影响不大。不过在1926年我才到哲理时，即有组织“研究读书会”的事情。我同几个进步分子开会，讨论革命的理论，内容完全忘记了，因为不久我就到广东工作去。“梓植”是我的暗名。我党初期的关系，来往通讯是由邮寄的，在决定工作时，必须决定以后联系的关系，用一个假造

的姓名，邮寄某某大学，组织方面派人在收发处领取。当时的通讯处是在上海闸北青云路上海大学，我叫陈国柱，别号叫子石，梓植与子石兴化音同音，故用梓植。中央给下层的信叫“宗组之”即总组织之名字，一看就知道是谁的信。

我这里所说的“读书社”是“党团组织”的化名，“民校”是国民党的化名，因为那时在北洋军阀统治之下，他们时常检查书信；只好用化名，有时写信用药水写的，写在小说的书上或法帖的后面，用书刊寄去，谁也查不出来。以后党内有叛变分子告密，这方法不能应用，则用另外的方法。

四、关于国共合作和統一战綫問題

关于这个问题，有些同志对于中国革命史不够深刻了解，所以常犯主观的毛病，以为那时期国民党是和以后“清党”后的国民党是同样地坏，把共产党在国民党里所做的工作一概否定。孙中山的国民党，在国共合作以前，徒有虚名，过去同盟会所遗留下的党员多数堕落腐化，就是有些比较好的党员，也高高在上，沒有深入下层。自从民国十三年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国共合作。国民党才改变了样子，吸收了新鲜的血液，国民党才有进步，而且迅速地扩大起来，北伐的胜利，主要是共产党领导的，沒有共产党，则第一次大革命就不能成功。本来未合作以前国民党空有虚名，根本沒有基层组织，也沒有基本群众，只有光杆党中央。合作后，才到处扩大，完全是共产党员在那里起了转变作用，初期国民党的中央领导机关重要负责的起积极作用的也都是共产党员，如毛泽东是国民党宣传部长，谭平山是组织部长，吳玉章是中央秘书长，底下也多数是党员同志，因而当时的国民党

真是有声有色，得到大多数人民的拥戴。此其一。再则当时虽然有统战工作，但只限于上层领导机关，而国民党的下层基础，则都是共产党员在负责和领导的。“统战”工作的名义，当时并没有提为主要的口号。这时期不叫“统一战线工作”，而是叫做“联合战线”。所以我们对国民党左派、其他的群众团体的来往，也是以自己的活动职业或某种名义出现。了解这些，才能了解我们当时在国民党的作用。

莆田党的组织成立以后，当时最主要的工作即是强化国民党的组织机关，因而莆田的国民党筹备会的成立，随着党的组织的建立立即出现了。那么；①国民党筹备会的成立，最初是1926年3月8日以前。当时是在北洋军阀董胜标统治之下，反动派对国民党的害怕，比共产党更为厉害。所以最先筹备会是以秘密的方式出现，因而我向中央报告称为“民校”。②但当时大夏同学的国民党分子，如郑炳炎、曾天毅（注：仙游人），郑春鏊及陈震等也在筹备成立国民党县党部，但他们没有群众基础，成立不起来，只好来找我商量共同成立，于是我就答应同他们合作。这是1926年8月的事。当时我从广东回来，继续在哲理任教，所以就正式成立筹备会，但还是秘密的。

△ 当时成立的国民党的基层组织称为区分部，是以党、团的支部为基础的。凡是党团员，要参加党团的支部会，也参加国民党的区分部会议。以后即以党的支部或同国民党的区分部为基层，在各乡进行农民协会分会的组织。

△ 所谓陈乃元、何子扬等砺青派的国民党员，是闽南张贞和宋渊源等民军系统的组织，在国民革命军北伐前在闽南的关系中派生出来的。那时他们投机组织国民党，这些人我们称他们为

右派。后来变为反动派了。当时国民党的左派，是指哲理中学的学生、涵中的学生、四师的学生而言，有曾天毅。陈震、林珠光、陈其挥等许多人，名字记不清。

△ 1926年8月以后的形势就不同了。

1926年冬，北伐军经过仙游时，广东党中央托东路军司令部参谋胡秉铎同志带给我的信，要我到仙游东路军司令部谈话，布置工作。因为我对仙游地方不熟，带曾天毅同行。我们一天走路，到半路坐上汽车，人多挤得要命，连我仅有的胶皮鞋也掉在车上没有看见了。第二天才见到胡同志。在何应钦司令部，胡同我说了很简单的话，看他的样子，还有所顾虑，这大概是极密的事。

原来从“三月二十日中山舰”事件以后，所有第一师的共产党员都被捕了，以后第一军中根本没有共产党员。据胡秉铎同我说，司令部还有四个共产党员，都是参谋，其余各部更没有共产党员了，有的都是孙文主义学会专门反共的人。环境恶劣，他不久也要离开，只嘱我要做发动反对右派、深入下层工作等几句话，又问我要不要见何应钦。第二天见面后，寒暄罢，他犹豫一下说：“不要见何指挥了，你们回去吧！”大概当时局势有些变更，所以他不再说其他问题。也可能看曾天毅在旁，他不便提出，从此就分离了。胡秉铎的指示，是根据中央的指示，因为当时总的中央在上海，广东也有中央一部分同志，陈延年知道我在莆田，所以特别要他找我。胡是何应钦的外甥，“清党”后在南京被国民党枪毙了，何应钦也担保不了他。

我们根据胡同志的指示，就在莆田和右派斗争，鼓楼顶的跳楼，发动各区农民“反对豪绅地主”，“二五减租”，“打倒土

豪劣绅”等口号就是这样提出来的。

△ 当时所谓政治监视员，在福建方面有：漳属陈文总、泉州陈祖康，莆仙陈炳中（仙游人）。大概是前方指挥部委任的，名义很大，但都是摆空架子。陈炳中夤缘附会，取得此职，于是大做其官，其实没有任何职务，主要的是监视下层。但他所做的，在莆田方面是反对“太激烈”，主张法治，可是谁也没有去理他。许子烈是仙游人，和我哥哥同学，属于“乌派”。他和陈炳中在仙游被吴威部姓王的团长逮捕，陈被枪毙。许子烈听说是被运动以陪斩释放。陈炳中用有铅尾子弹射击，胸前炸一大洞死。但他不是因为“左派”而死，是因为仙游地方派系的矛盾而被杀的。王团长是“白派”，陈炳中是“乌派”，以后“乌派”大作宣传，宣传是为革命而死，其实是借题发挥的话。陈炳中是燕京大学学生，思想极顽固，做官时候，娶莆田有名的教会财主（买办）宋德新收师的姑娘为妻（未结婚），一到莆田，就和美会外国人勾勾搭搭，还有什么革命性？

五、关于反革命政变问题

△ 1929年4月29日的报导仙游清党大会被通缉的人，都不是共产党员。陈侃是丁超五的秘书，始终没有跑。黄金秀是东乡人，和“乌派”不对，以后死于“乌派”之手，也不是共产党。陈嘉谟、郑杰民是上大的共产党员，可是通缉没有他们的名字。其实他们当时都投靠林寿国受到保护了。这是“乌派”和地方实力派争权夺利的打架而已，登报是他们自己吹牛，借以欺骗群众。果然不久，林寿国一上台，他们都公开活动了，于是转向敌对派开刀。

六、成立閩南特委是“八七会”議 后莆仙党的問題

△ 上面已经说到我在涵江的小火轮上遇到郑杰民，我们坐船经浙江、温州、宁波、另外换船到上海，住在法租界的亭子间里，大约二个礼拜。我到大夏，遇到杨邦彦，他也是闽南逃出来的。大概是六月初旬，我和杨邦彦坐太古公司的船，到汉口住江滨法(英?)租界的招待所内，这招待所是党中央租赁供各地反动区内逃难的同志们住的。七月中旬到下旬，我们两人回上海住了一个礼拜。于七月底某晨到十六铺码头上船，准备回厦门，忽见我的死对头何子扬也在船上，我就折回大夏大学找同乡许担青、阮厚坤二位同学处再住五、六天，在上海报上看“八一南昌起义”的报导。所以我当时的结论是：

(一)我们由中央派回福建经上海上船是在“八一”南昌起义以前的日子，不是在“八七会议”以后的时候回厦门去改组什么“闽南特委”。

(二)那时是清党以后，各地的党员逃散的逃散，“掩蔽”的“掩蔽”，各地的组织有的散伙，有的正在混乱时期。当时厦门市委被破坏，罗、杨等同志被枪毙，各地的组织正在待恢复整顿，还有什么现成的组织可“改组”呢？

(三)回去厦门的时候是在“八一”南昌起义以前，还没有开“八七会议”的决议之事。而且当时军事很紧张，有的中央负责同志正在随军南下，有的分途回上海，北方等地布置机关，还来不及专门派人到各地去传达“八七会议”。

△ 根据以上我所回忆和分析的实际情况看来，所谓特委的